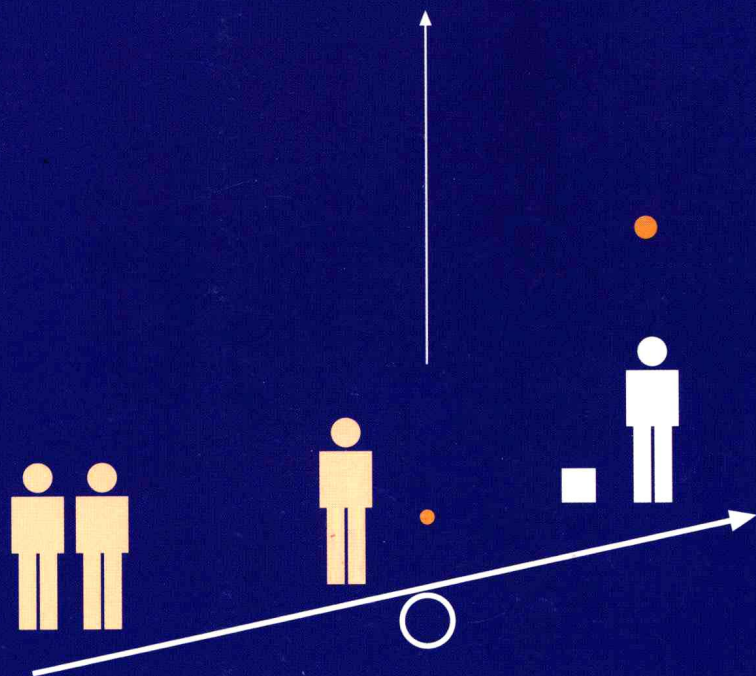


CAMBRIDGE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Rachel Murphy



政治与社会译丛

[爱尔兰] 瑞雪·墨菲 著

黄涛 王静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在分析农民外出打工如何改变农村的时候，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之间各种各样的互动作用非常重要。社会行动者通过外出打工和返乡来利用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包括巧妙地利用那些对他们达成目标的能力构成限制的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他们通过与城市雇主、农村干部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获取和利用城乡两方面的文化和经济资源。通过农民流动，城市的价值和资源与农村内部价值互动，赋予了农民工和返乡者一个开阔的“视野”，帮助其形成后来的新目标。与此同时，由于让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外出打工使他们在与家庭成员和农村社会中的其他行动者进行协商时说话更有分量。很多人正在使用他们手中的资源追求他们的目标，而他们采取的方式正在从社会和经济方面变革农村。通过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的持续不断的反馈，外出打工和返乡变成了农村中的习俗，一种农民工和非农民工都参与其间的习俗。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 (爱尔兰)瑞雪·墨菲著;黄涛,王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3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2辑)
ISBN 978-7-213-04003-0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8-59号

I. 农… II. ①墨… ②黄… ③王… III. 农民—劳动就业—影响—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IV. D669.2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8563号

书名
作者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爱尔兰]瑞雪·墨菲 著
黄涛 王静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电脑制版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印刷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张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17.25

插页

27.7万

版次

2

书号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ISBN 978-7-213-04003-0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致 谢

这本书源于我从 1995 年 10 月开始撰写的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从那时起,我对很多人心存感激。

首先是我的辅导老师 Peter Nolan。我要感谢他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引导,感谢他在我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宝贵指导。

Tim Wright 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他后来一直给予我很好的建议和鼓励。我要感谢他几次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的草稿,他的建议始终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他们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我还很感激剑桥现代中国丛书的编辑 William Kirby、剑桥的编辑 Mary Child 和她的助手 Mike Green。我也要感谢制作人 Cathy Felgar,还有一丝不苟的技术编辑 Matt Darnell。

Jeremy Riley 以极大的耐心和善意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非常感谢 Jeff Vernon,他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并提出了对我很有帮助的一些想法。对于 Christine Minas 和 Godfrey Yeung 的宝贵建议,我也深表感激。我还很感谢 Christine 对本书目前版本中的某些章节提出的编辑意见。

Delia Davin 和 Beverley Hooper 对第五至第七章的草稿提出了有益的评论。Geoff Hawthorn 和 Paul Martin 阅读了目前版本书稿的大部分,他们也作了有益的评论。

我要感谢 Robert Ash、Geoff Hawthorn、John Sender 教授给予我的支持与鼓励,同样也感谢 Anne 和 John Harrison 对手稿快速而全面的校对。

我举办了两次座谈会,参与者们都慷慨地提出了问题和意见,并给予我极

大的鼓励。一次是1998年3月9日在联邦外交办公室关于“中国：关键点”的一日会议上举办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社团主义”座谈会；一次是1998年7月31日在海牙农村发展系列研讨会上举办的“移民、消费与农村不平等”座谈会。特别要感谢的是Jos Mooij、Bridget O’Laughin 和 Max Spoor 对这次研讨会提出的建议。

我要感谢 James Alexander、Eric Breton、Nicole Craddock、Christine Minas、Firouzeh Sabri、Mukund Unavane、Jeremy Riley 和 Jeff Vernon，他们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给予了我宝贵的友谊和自始至终的支持。

在中国，我要感谢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尽量表达。我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是通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安排的，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赵年国（音译）为我安排了到万载的实地调查。他在“文革”期间下乡到那里，那里的乡亲们至今还记得他。江西社会科学院的谢小伟（音译）曾经是万载县的副县长，他也帮助我进入万载。在那里，我的实地调查完全得益于当地领导的支持，他们非常开明而务实。在青松和安吉村，吴书记和周主任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我对他们本已十分繁忙的生活来说是一个负担，我要感谢他们的善良和帮助。万载中学的校长郭先生，帮助我融入万载地区，他与丰城干部的关系也让我能对丰城的荣塘镇进行调查。我还要感谢高城镇的干部，他们提供了统计资料并为我介绍了当地的发展状况。

感谢于都劳务输出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来继东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我安排到于都进行实地调查，也感谢在上海码头的于都打工者，他们很乐意让我分享他们的打工经历。也感谢张卫东（音译）先生和徐先生同意我在于都逗留。郭国鹏（音译）是一位得力而耐心的向导，他为陪同我在于都进行调查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在信丰的实地调查是通过澳大利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交换奖学金实现的，他们委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做实际安排。对奉新县的短期调查也得益于这个奖学金。我非常感谢这两个社会科学院，包括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刘先生和范先生，以及信丰县外事办的卢先生。我也感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的 Barry Glissold 和 Sue Rider。最后，我非常感激那些以各种方式协助我进行实地调查的人们和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们。

没有剑桥三一学院慷慨的经费支持，这一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感谢我的导师 Chris Morley 博士，他保证了我在中国的调查总能有足够的经费，并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解决我的各种疑问。三一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各位老师 Morley 博士、Hazel Felton 和 Sheila Roberts 一直以来都非常热心地帮助我。我也很感激海外研究奖学金的支持。

在剑桥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的教师中,我要感谢研究生秘书 Joy Labern 和 Silvana Dean 对我的帮助。剑桥耶稣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修改我的书稿。我也非常感谢英国社会科学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 Bill 给予我的爱和鼓励。

虽然本书因很多人的友好和帮助而得到丰富,但最终的成果和书中的观点由我本人负责。

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我使用我的文章中的材料,《移民对农村中家庭间不平等的影响:对江西万载的案例研究》,《中国季刊》第 165 号(2000 年 12 月),第 965—982 页。感谢卡范科斯出版社同意我使用我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社团主义:江西南部两个县的经验》,《当代中国杂志》2000 年第 9 期,第 231—248 页。还要感谢泰勒与弗朗西斯出版社同意我使用我的文章中的一部分,《中国江西南部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与经济多样化》,《世界发展杂志》1999 年第 11 期,第 661—672 页。感谢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同意我使用我的章节中的材料,《江西农村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与国家资助的城镇化发展》,载于 John R. Logan 主编的《中国新城市: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改革》(牛津:布莱克维尔,2001),第 229—244 页(该文是对前述两篇文章的修订和扩展)。

最后,我要感谢《打工族》(原名《外来工》)杂志同意我从《外来工》1997 年第 11 期第 44—45 页上复印两幅漫画。特别感谢画家魏来(音译)同意我使用这两幅漫画。

我在城市打工

于成大

(以下是他的诗中的几段)

又一个风尘满面的清晨
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卸下行囊和梦想
一片片楼群的大森林比故乡的
苹果树更高 更密
叶子般的玻璃上结满鲜润的灯光
这些酷似月下露水的灯光啊
并不能滋润我干裂的嘴唇……

在这里 我们必须告别那种
黄牛耕地般的节奏
必须以汽车般的速度去追赶时光
以更富韧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生活
恣意的汗水流淌得更加淋漓酣畅……

每到月末 我们总会风雨无阻地
走进邮局
寄走一沓薄薄的但却是沉沉的钞票
去揩干故乡的思念和贫穷……

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卷好行李

回归一条熟悉的路途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远方 有秋与农事在等我们

摘自《中国农村青年》1996 年第 2 期,第 29 页

目 录

图表目录	5
致谢	1
诗歌：“我在城市打工”	5
导 言	1
实地调查	2
理论方法	5
研究纲要	7
第一章 价值、目标和资源	9
1.1 现代化和结构主义理论	11
1.2 超越二分法：价值、目标和资源	17
1.3 小商品生产者和生计多样化	24
1.4 临时的和永久的返乡	26
1.5 结论	28
第二章 中国、农村及实地调查	30
2.1 历史背景	31
2.2 红色中国的农村重建	34
2.3 万载、信丰和于都农民的外出打工	38

2.4	为什么中国农民工仍与其家乡保持联系?	45
2.5	提高人口素质:作为现代性使者的返乡者	47
2.6	农村生计多样化	50
2.7	结论	54
第三章	资源再分配与不公平	55
3.1	关于农民外出打工对农村不公平现象影响的调查	56
3.2	人口流动、家庭构成与不公平	60
3.3	农民外出打工在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	68
3.4	农民外出打工、土地与不公平	72
3.5	结论	85
第四章	打工、汇款和目标	87
4.1	教育	91
4.2	人生阶段性目标:建房和结婚	99
4.3	外出打工与消费商品	110
4.4	结论	113
4.5	关于教育的附录	114

第五章 征募建设企业和乡镇的返乡者	117
5.1 国家层面的返乡与企业家	117
5.2 于都和信丰的返乡者	121
5.3 耐心等待凤凰在巢中下蛋	130
5.4 结论	137
第六章 企业和企业家	139
6.1 企业:规模、类型及所有权	139
6.2 哪种凤凰会下蛋?	148
6.3 返乡的原因	154
6.4 女性返乡企业家	162
6.5 结论	168
第七章 企业家、社会经济变化以及与政府的互动	170
7.1 投资	170
7.2 改善商业的政治环境	173
7.3 吸收剩余劳动力	176
7.4 “现代的”管理者	179
7.5 将家乡整合到国家市场经济中	181
7.6 乡村的城镇建设	183
7.7 结论	186

第八章 带着失落的情绪和空空的钱袋返乡	187
8.1 因失业而返乡	187
8.2 疾病和受伤	191
8.3 怀孕和照料孩子	193
8.4 婚姻和家庭	194
8.5 重新适应的问题	202
8.6 结论	204
第九章 结 论	206
9.1 资源的重新配置	207
9.2 目标及汇款的使用	208
9.3 返乡的农民工企业家	210
9.4 最后的思考	213
参考书目	214
索引	237
译后记	252

图表目录

表格

2.1 所调查县的经济指数与国家和省际水平以及打工目的地的对比,1997	40
3.1 家庭层级	61
3.2 31 户家庭的每亩粮食出产及猪的生产价值	83
5.1 信丰和于都返乡企业的创建	122
6.1 所调查企业的数量、类型及规模	142
6.2 受访者返乡前的平均月工资(元)	155
7.1 返乡者公司的投资以及从国内获得投资的比例	172
7.2 作者走访的返乡者企业的新增就业情况	177

图示

3.1 129 户家庭中成年劳动力中的打工者数量	63
3.2 129 户拥有成年劳动力家庭的经济层级	63
3.3 129 户拥有成年劳动力家庭的经济层级统计分析	63
3.4 129 户家庭中拥有打工者和当地非农业劳动力的家庭的经济层级统计分析	71
3.5 青松、安吉村组中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和外出劳动力百分比	76
3.6 根据 129 户家庭可耕种土地面积所划分的经济层级统计分析	78
4.1 以流动状态衡量 138 户家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96
4.2 以年龄、性别衡量 138 户家庭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	115
4.3 高城中学所有在册登记学生中男女学生比	115
4.4 高城中学第二年没有继续注册的学生百分比	116
4.5 万载县第二年没有继续注册的学生百分比	116
6.1 返乡者在城市的逗留时间与返乡者创办企业的规模	151
6.2 企业家返乡时的年龄及其创办企业的规模	151
6.3 返乡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创办企业的规模	152